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20 冊

一心運時務：
正德時期（1506-21）的王陽明

楊 正 顯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一心運時務：正德時期（1506-21）的王陽明／楊正顯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2+258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編；第20冊）

ISBN：978-986-254-349-8（精裝）

1.（明）王守仁 2.學術思想 3.陽明學

126.4

99016459

ISBN - 978-986-2543-49-8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 編 第二十冊

ISBN：978-986-254-349-8

一心運時務：正德時期（1506-21）的王陽明

作 者 楊正顯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0年9月

定 價 十編40冊（精裝）新台幣62,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一心運時務：
正德時期（1506-21）的王陽明

楊正顯 著

作者簡介

楊正顯，祖籍安徽省宿縣，一九七三年出生於臺灣臺南市，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博士後。著有《陶望齡與晚明思想》、〈道德社會的重建——王陽明提倡「心學」考〉、〈王陽明詩文輯佚與考釋〉、〈王陽明佚詩文輯釋與補正〉等。

提 要

本文「一心運時務：正德時期的王陽明」，旨在了解陽明在正德時期（1506-21）的思想變化，希望透過對陽明在正德年間種種作為的考證，釐清其思想與現實環境間的關係，以透顯出其思想的精神。

第一章「龍場之悟」在說明陽明「龍場之悟」的前因後果及其思想內容。從王華與陽明所參與的會社性質之變化，可以看出當時學風轉變的契機，而這反映出陽明所處的時代危機是「道德」觀念漸趨淪喪。發生在正德元年「誅八虎」計畫的失敗，不但招來往後的「丁卯之禍」，也更加證明當時的國家社會的道德秩序逐漸崩解。陽明因為要營救妹婿及朋友的關係，上疏言事，因而下獄被貶謫至龍場。在歷經「泛海」的歷程後，對其自身的出處有了堅定的看法，也因而能夠在龍場反思國家社會問題的所在，進而提出「一心運時務」的思想架構，其中心思想是「心即理」說。

第二章『聖人之學』是『心學』在說明陽明回到北京任官後，如何開展其「一心運時務」的思想架構，並且進而在南京時提出「聖人之學是心學」的轉變過程。由於宦官劉瑾被殺後，正義反而沒有被伸張，相反地卻呈現是非更加不明的情況，而曾經是「丁卯之禍」受害者的陽明，卻因為其父親行賄事等的披露，無形中被當權者所打壓。但陽明卻在此時積極地宣揚他的「君子之學」想法，希望重建一道德完善的社會。但由於陽明強調對於一個人「內心」的治理，使其思想被劃歸為陸九淵之學或是禪學之類。當陽明至南京時，與魏校為首的學術集團有了門戶之爭，雙方爭論的焦點即在於一個人如何能靠著內心的治理即能經綸時務呢？陽明透過對「三代之治」理論基礎的理解，提出「三代之學是心學」的口號，因此如要重復「三代之治」，就必須依靠「心學」，而陽明此言亦是在呼應皇帝廷試題目。為了要證明朱熹也是從事於「心學」，陽明編著了《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來回應當時朱學學者的攻擊。

第三章「聖賢骨血：良知」在透過陽明軍功建立與其思想轉折間的關係，來說明其「良知」說的形成經過。陽明在平南贛盜的過程，逐漸瞭解到去除私欲的關鍵即是「本心之明」。而這個想法在其歷經「忠泰之變」後，有了更清楚地輪廓，透過對周敦頤及程顥思想的思考，提出判別是非的標準即是「良知」，即是「本心之明」。另外，也說明陽明新〈大學古本序〉是作於正德十六年。



目 次

前 言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回顧	6
第一章 龍場之悟	13
一、成化弘治時期學風改變的契機	14
(一) 王華的會社網絡及性質	15
(二) 陽明會社性質的變化	21
二、丁卯之禍	26
(一) 「誅八虎」事件	26
(二) 陽明上疏的緣由及後果	29
三、曲折的貶謫路	34
(一) 「泛海事」的真假	35
(二) 出處心態的轉折	42
四、聖人之道：心即理	45
(一) 對李東陽作為的反思	46
(二) 「一心運時務」的思想架構	49
小結	56
第二章 「聖人之學」是「心學」	59
一、時代的需要：君子之學	60
(一) 後劉瑾時代：主政者對「君子」的打壓	60

(二)「君子之學」的工夫：明其心	67
(三)「君子之學」的功效：變化氣質	75
二、「聖人之學」的展開	78
(一)南京時期的「門戶之爭」	79
(二)「三代之治」的基礎：心學	86
(三)對朱學學者的反擊：《朱子晚年定論》	91
小結	95
第三章 聖賢骨血：良知	97
一、平南贛盜：破心中賊	99
(一)「軍前違期」事件	100
(二)本心之明：祛除私欲的關鍵	105
二、平宸濠的後果：忠泰之變	112
(一)政治鬥爭的焦點：交通宸濠的關鍵報告	113
(二)從政到講學	121
三、判別是非的標準：良知	124
(一)「良知」說的學術脈絡	125
(二)「良知」說的文本：新〈大學古本序〉	129
小結	134
餘 論	137
參考書目	143
一、原始資料	143
二、近人著作	151
三、論文	155
四、地方志	161
五、外文著作	168
附錄：王陽明散佚詩文集錄	171
一、可確定年代	171
二、無確定年代	245
後 記	257

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以來，研究明代王陽明（字伯安，名守仁，封新建伯，諡號文成，1471～1528）學說及其傳播的歷史過程，不但有較多學術著作的出版，〔註1〕且陽明弟子們的文集也陸續點校刊行，〔註2〕另外，也有以陽明思想為主題

〔註1〕如錢明，《陽明學的形成與發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儒學正脈——王守仁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吳震，《聶豹、羅洪先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陽明後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繫年 1522～1602》（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彭國翔，《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臺北：學生書局，2003）、鄧志峰，《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鮑世斌，《明代王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4）、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 1522～162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季芳桐，《泰州學派新論》（成都：巴蜀書社，2005）、蔡仁厚，《王學流衍：江右王門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杜維明，《宋明儒學思想之旅——青年王陽明（1472～1509）》，收錄在氏著《杜維明文集（第三卷）》（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頁1～186，此文是其博士論文中譯本，原出版於1976年。其中，也有相關的書評可供參考，例如：Thomas A. Metzger 著、塵觀譯，《實際行動的新儒家思想——評〈王陽明的少年時代〉》，《出版與研究》29（1978），頁32～3；林月惠，《本體與工夫合一：陽明學的展開與轉折》，《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6（2005），頁359～396。

〔註2〕如《陽明後學文獻叢書》，收錄有徐愛、錢德洪、董澐、王畿、鄒守益、聶豹、

的期刊、合集的出版。〔註3〕這表明「王學研究」在學術界是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境況，在現今思想史研究趨於沒落的時期，可謂令人振奮。從這些著作中，可以歸納出幾個研究的面向：一是在研究主題方面，較偏重於王門後學的分化問題、各地區講會活動與發展情況、後學對陽明良知概念的不同解釋、基層王學的推展等；二是研究的時段方面，對於陽明思想的討論，時間點偏重於其晚年歸越講學後的種種發展。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研究是討論陽明思想對當時士風所產生的影響，〔註4〕但對於陽明本身方面的研究則沒有進展。〔註5〕三是從事於王學研究的學者，其學術訓練的背景大多是中文與哲學學科，反而歷史學本科出身的學者則是相當的少。這樣的情況使得吾人對陽明的認識就偏重於其思想概念的理解，而未能深入探究這些思想概念產生的契機，例如說陽明思想的變化與當時學術與政治間關係，究竟有何關連？

所以，雖然說透過這些著作，可以深入瞭解陽明後學對其思想的推衍，但對於陽明學說的成立，以及如何在正嘉之際（1506～66）興起的原因及過程，卻是語焉不詳的，使人有陽明學說成立的過程及其之後發展過程已獲得合理解釋的錯覺。尤其是這些著作在敘述陽明思想的發展歷程時，或是引陽明門人錢德洪所編《年譜》中的記載，一語帶過；〔註6〕或是引相關學者的看法來佐證，但這些看法並未有明確的說明。〔註7〕現今為止，仍然未有深入且

歐陽德、羅洪先、羅汝芳。

〔註3〕例如有紀念陽明「龍場悟道」490年所編的論文集，《王學之思》（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9）、吳光主編的《陽明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以及《陽明學刊》的創刊等。

〔註4〕如左東嶺，《李贄與晚明文學思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註5〕唯一的例外是〔日〕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献学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7），此書對陽明著作的年代、版本考證翔實，值得參考，且此書「附錄」收錄大量陽明佚文。

〔註6〕如鮑世斌在其《明代王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4），第一章「王學的產生：王陽明的心學」中，尤其是第一節「王陽明思想的形成」，大都引《年譜》為證。

〔註7〕如葛兆光就引祝平次的看法，認為從明初以來「這種心、理的結構關係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慢慢被加深擴大，就終於引來知識和思想世界的大變化，而王陽明就是最後捅破這層窗戶紙的人。」見氏著《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頁407；然祝氏的說法

詳實的著作，清楚地說明陽明的思想歷程及轉折，更遑論往後陽明學說在正嘉時期的發展情況。（註8）

因此，從這些著作中，無法讓吾人對於陽明思想精神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其箇中原因在於這些著作對於陽明思想成立的描述，是建立在空泛的說法上，甚至有些是人云亦云的。之所以會有如此的情況，關鍵點並不僅僅是學者們研究方向與取徑的問題，而是沒有真正地從陽明所處的現實環境來理解其思想的概念。也因為不清楚陽明思想的現實因素，致使學者們在論述其思想時，容易陷入枝節的討論。所以，現今對於陽明思想研究的突破，應是尋找出其思想概念之間的脈絡，且這個脈絡必須與現實因素相配合。因為一個思想脈絡的出現不會沒有原因，脈絡的曲折的變化也不是隨意發生，其中必有其因果關係在的。所以，如果無法清楚地說明陽明思想產生與變化跟當時國家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那麼今日吾人對陽明思想精神的瞭解，仍然無法突破前輩們的看法。

因此，本文「一心運時務：正德時期的王陽明」，旨在了解陽明在正德時期（1506～21）的思想變化，希望透過對陽明在正德年間種種作為的考證，釐清其思想與現實環境間的關係，以透顯出其思想的精神。而筆者認為貫串陽明正德時期的思想脈絡，不脫「一心運時務」的主題。此語來自於陽明弟子徐愛（字曰仁，號橫山，1487～1517）在給另一弟子汪淵（字景顏）的詩，詩云：

時平眾競仕，意氣輕臯夔。一或遭險巇，惶惑失所持。哀哉中無主，此心任物移。君獨志賢聖，力學同余師。天子命出宰，人悞君自怡。

是試圖以明初五人——曹端、薛瑄、吳與弼、胡居仁及陳獻章——來說明在理學的發展上，明初的這五人的思想正是代表朱子的理學過渡到王陽明的心學階段，並未對陽明如何承繼及過渡提出說法，見《朱子學與明初理學的發展》（臺北：學生書局，1994），第三章「明初理學的發展」，頁115～76。另外，葛氏在「再起波瀾：王學的崛起及其意義」此節中，直接從嘉靖時期講起，也完全沒有論述為何王學的崛起要從嘉靖算起。出處同上，頁408～38。

〔註8〕

如吳震《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繫年1522～1602》和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二書，其內容重心放在陽明及其後學的講學活動，且時間點為皆為嘉靖元年（1522），但那已是陽明歸越之後，人生最後的七八年時光了。而陽明歸越之後，現實環境仍然對其有重要的影響，如「大禮議」的發生、服闋後起用的問題，以及最後征思田二州的事情，這些事情對其思想的發展仍然具有相當關鍵的因素，如不能清楚地說明這些事情，而僅僅是扣緊於「講學」一事，就忽略了政治對陽明思想的影響。

時務良艱難，一心運有餘。莫析政與學，皆當去支離。……〔註9〕

在此詩中，徐愛指出當時的士大夫官員的問題，認為這些人平時的作為好像是超越了古代的臯陶與夔，但是一遇到困厄之時，就惶惶恐恐，若無依靠的樣子。主要的原因是這些人心中無主，所以才會隨波逐流。然而，因為汪淵也與徐愛一樣師從陽明，所以，心中有主，靠著「一心」，對於再艱難的時務都可以應付，游刃有餘。徐愛這樣的看法，其實是來自陽明，陽明在給王道（字純甫，號順渠，1487～1547）的信中說到：

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註10〕

陽明認為面對國家時務的問題，也不會出於「一心」的範圍；也就是說陽明認為透過一個人自身的「心」，即能因應人事酬變。而這「一心運時務」的看法，不但是陽明當時的教法，也貫串其貶謫龍場後的思想脈絡。而由於現今學界對陽明的瞭解，較偏重於其晚年於越中宣揚良知說、四句教爭論、講會舉行、學術轉折幾變問題的探討等等，但對於其為何上疏言事導致貶謫的過程、編定《朱子晚年定論》一書的原因，以及陽明平南贛盜、平宸濠的軍功等，都未見有專門的篇章來說明這些活動內容，當然也就沒有解釋陽明在經歷這些事件中的思想脈絡與變化。也就因為對這些事件過程缺乏認識，導致對其學說成立的原因及變化，語焉不詳，毫無脈絡可尋。這也就是筆者為何要將討論陽明思想的重心放在正德時期。

本文在處理陽明思想脈絡的問題時，試圖扣緊兩個面向。一是陽明自身學術背景問題。陽明思想歷程之複雜與多變是眾所皆知的共識，然而學界對此共識的討論，卻流於爭論到底有幾變的問題，而不從思想歷程中來釐清其變化的因果關係。就筆者的觀察，其中的關鍵在於學界對於陽明早年生活型態與學術背景及人際關係等，都沒有清晰的瞭解。舉例來說，學界對陽明早

〔註9〕〔明〕徐愛，〈送汪景顏尹大名〉，《橫山遺集》，收錄在錢明編校整理，《徐愛、錢德洪、董澐集》（陽明後學文獻叢書）（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頁5～6。

〔註10〕〔明〕王守仁，〈與王純甫（1512）〉，《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文錄一〉，卷4，頁154～5。

年的活動，大都以《年譜》中的記載來說明，但是這簡略的記載，實難拼湊出稍具輪廓的歷史樣貌，更無法接續其往後思想的發展。此外，連陽明的「家學」情況也甚少人提及。此外，學界又常以《年譜》及陽明詩文來說明其早年曾受到佛道兩家思想的影響，但影響的層次與內容又在何處？這部分也甚少人關注與討論。〔註11〕當然，以上有些問題是與資料的限制有關的，無怪乎學者們將大部分研究重心放在陽明思想定型後的發展及影響。例如對《傳習錄》內容的闡釋、與湛若水間的論辯、學術思想變化的階段、講會的推行、門人弟子及再傳弟子對陽明學說的異議與改造，以及陽明學說對明代中後期社會各層面的影響，諸如此類。因此，能不能發掘出更多陽明早年的生活樣態，例如說他的父親王華對其影響、經歷過怎樣的人生變化、都與那些人來往等等，就是本文能否重建陽明思想歷程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二是陽明思想中的現實因素。由於陽明的思想並非一開始就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而是因應來自各方的影響與挑戰，而逐漸形成的，這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對舊的學術傳統的反省，而此反省亦是有感而發的。過去學界的研究偏重於陽明個人思想內容的闡釋，而較少從整個明代的政治文化來切入，觀照其思想成立及轉變的意義，就使得陽明的思想顯的孤伶伶的，似乎與當時代有著很遠的距離。然而，僅僅耙梳《王陽明全集》，即可發現，不論是早年上疏言事而被貶謫至龍場，抑或是中年的軍事功名的建立，乃至晚年嘉靖時的「大禮議」之爭，〔註12〕都顯示其思想與現實政治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能夠弄清楚陽明政治的那一面向，不但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其思想轉折及著重的意義，也能映照出當時代的問題究竟為何？思想要能說明並且解決當時代的問題，這個思想才能吸引人們，也才能產生深遠的影響。

〔註11〕柳存仁的研究只說明陽明與佛道人士的相關交涉，但並未有實質說明這樣的接觸影響陽明為何？見〈王陽明與佛道二教〉，《清華學報》13：1、2（1981年12月），頁27～52；〈王陽明與道教〉，《和風堂文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35～55。鍾彩鈞的〈陽明思想中儒道的分際與融通〉一文則探討陽明與道教間的關係，說到「陽明對道教的態度，若從一生思想發展言之，則青年時沈溺其中，中年時力闢其非，晚年則在理氣觀、以及重視生命與自然的方面加以融攝。」《鵝湖學誌》8（1993），頁75；秦家懿的〈王陽明與道教〉一文則對陽明與道教的接觸及詩文做出粗步的解釋，收錄在黃俊傑等主編，《東亞文化的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96），頁269～87。

〔註12〕關於陽明對「大禮議」的態度，近年來受到較多的重視，相關研究回顧可見胡吉勛，《「大禮議」與明廷人事變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序論：關於「大禮議」已有之研究及展望」，頁1～55。

二、研究回顧

學界對於陽明思想的研究可從大體與細部兩方面來談，大體部分主要是談王學如何興起的問題，也就是立基於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王學思想發展，論述的重心是學術思潮如何從程朱學到王學的變化過程。細部的方面，主要是談陽明本身的問題，也就是學案式的討論，論述的重心是其思想概念的闡釋；不過近年以來開始對陽明世系源流、家學、在家鄉的活動、與文人間的交誼等等，有了更多的討論。以下將分而簡述之。

對於王學的興起或發展，學界的觀點大概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朱學的「反動說」，一是「承繼說」。「反動說」的具體內涵，可以容肇祖在其影響力頗大的《明代思想史》中的說法為代表，他說：

王守仁的思想是朱學的反動，有得於陸九淵，而直接則受有陳獻章的思想的影響。〔註13〕

容先生說法源流自《明史》「儒林傳序言」，其中說到：

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註14〕

從清朝政府擁護程朱學的立場所編之書，批判王學，將朱學與王學對立起來，也是順其自然的事。其中特別要說明的是，所謂朱學與王學的分野，是著眼於王學大盛後，擁朱與擁王兩派勢力的消長，對王學的思想內容並未深究，也沒有說明王學因何而能興起的原因。〔註15〕有學者企圖解釋，因朱學在明

〔註13〕容肇祖，《明代思想史》（濟南：齊魯書社，1992），頁73；嵇文甫也說「由他（王陽明）所領導起來的學術運動，是一種道學革新運動，也是一種反朱學運動。」見《晚明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第一章「從王陽明說起」，頁1；同樣的思路亦見於楊國榮，《王學通論：從王陽明到熊十力》（上海：三聯書店，1990），第一章「王學的興起」，頁1~27。

〔註14〕〔清〕張廷玉等，〈儒林傳〉，《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282，頁7222。

〔註15〕如于化民的研究，就直接訴說朱學與王學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上的對立，緊接著就討論王學分化的問題，完全沒有對「王學興起」的討論，見《明中晚期理學的對峙與合流》（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第一章「陽明哲學與程朱哲學的對立」，頁13~38。

代初中期產生了變化，故導致王學的興起，如唐宇元說「王學的緣起，是同時朱學思想的動盪、分化有關。」〔註 16〕但是，並沒有說明為何朱學思想開始動盪與分化？其內容為何？且又為何是王學，而非是江門之學取而代之呢？汪暉則認為由於朱學是配合著宋代的政治、宗法等文化而成立的，然隨著朱學在明代成為官方的學術，科舉之學的範本，因此其過去成立的原因，如批判含義，也因而消失，而陽明所提倡的「心學」即是在恢復此批判的精神，因而勢必對朱學的內容做轉化工作。〔註 17〕但如果是對朱學內容作轉化工作，那麼將如何解釋《朱子晚年定論》一書出現的意義呢？

「承繼說」則有兩種說法：一是對程朱理學的承繼，錢穆在《陽明學述要》書中，說到宋學留下的本體論（萬物一體之理在人之外或內）與方法論（變化氣質先從發明本心始或是博覽致知始）的問題，到了陽明手中獲得進一步解決與發展。〔註 18〕當然，錢穆指的是思想體系的面向，然而這樣的體系是如何造成的，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陽明提出這樣的體系，又為何這樣的思想能夠引起廣大的迴響？另一種「承繼說」，則認為陽明思想是承繼於孟子與陸九淵。例如牟宗三則談到陽明學說時，直截了當地說「王學是孟子學」，其依據是陽明對孟子「良知」概念的援引。〔註 19〕黃俊傑則是透過陽明對孟子思想闡釋的說法，提出說「陽明之透過釋孟以攻排朱子，顯示思想史上新的詮釋『典範』的興起。」〔註 20〕但如果仔細分殊陽明對朱子與朱子後學的看法，會發現陽明對此二者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陽明將朱子視為同道，而批判朱子後學的流弊，尤其是當時的朱學學者。楊祖漢則說陽明認為陸九淵之學是合於孔孟的傳統。〔註 21〕雖

〔註 16〕 唐宇元，〈朱學在明代的流變與王學的緣起〉，《哲學研究》9（1986），頁 75。

〔註 17〕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北京：三聯書店，2004），第二章第四節「朱子學的轉變與心學」，頁 291～8。

〔註 18〕 錢穆，《陽明學述要》（臺北：正中書局，1955），頁 1～36。事實上，汪暉的說法調和了「反動說」與錢氏的說法，而汪暉認為錢氏並未提出更多歷史事實來佐證，然就筆者閱讀汪氏的著作，也並未看到更多的歷史事實，仍然著重於概念的解釋。就筆者的粗步觀察，「承繼說」比「反動說」，更貼近歷史事實，從陽明在南都時編撰《朱子晚年定論》一書，即可看出陽明仍企望與朱子同路，而非一味地反對。

〔註 19〕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臺北：學生書局，1979），第三章「王學之分化與發展」，頁 215～311。

〔註 20〕 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第六章「王陽明思想中的孟子學」，頁 255～84。

〔註 21〕 楊祖漢，《儒家的心學傳統》（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第四章「陸象山『心

然三人都將陽明的思想連結於孟子與陸九淵，但是，又該如何去定位其他理學家如周敦頤及程顥，在陽明思想體系中的位置？

以上這二種觀點，都或多或少指出了王學與朱學之間的關係，但是陽明思想成立和朱學間的關係，〔註22〕並不是零合遊戲，有你沒我，單單從思想上的對立沒有辦法說明其成立與其內容。所以，學界還有從當時政治社會環境的角度來解釋王學的興起，例如包遵信就認為王學的崛起，並不是單純出於統治者的需要，而是時代的產物，與當時的社會思潮是脫離不了關係。〔註23〕余英時則從宋代政治文化的觀點，來觀察陽明思想與明代政治文化之間的關係，認為陽明因為「得君行道」的想法，無法實現，故轉到「覺民行道」的路子上去。〔註24〕相對於「反動說」與「承繼說」，包余兩人的作法在現今王學的研究之中，是相當少見的。

所以，研究陽明思想成立的過程，應該將其思想緊扣在當時國家政經社會的發展，觀察從成化弘治年間以來，因為政治倫理的變化，所引起種種價值觀念的轉變。其中有些轉變，動搖了傳統既定的道德觀念，在學術界引起一連串對道德與事功等問題的討論。身處此時的陽明，如何面對這一連串價值觀念的變化，實與其思想的成立有絕對的關係。

對於陽明本身的研究，除了對其「良知」概念的研究汗牛充棟外，〔註25〕對於其生平事蹟的考察研究，相對而言，則是非常的少。在陽明早年的活動事

學』的義理與王陽明對象山之學的了解」，頁137~96。

〔註22〕余英時就說「他（陽明）的良知之說，可以說主要是和朱子奮鬥的結果。儘管我們在思想史上常說陸、王，其實陽明跟陸的關係並不很深，反而是和朱的關係深些。」見〈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收錄在氏著《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1976），頁131；汪暉也指出說「陽明學是在與朱子學的對抗關係中展開的，但這兩者的關係遠不只是批判、反抗等否定性概念所能概括。」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頁302。

〔註23〕包遵信，〈王學的崛起與晚明思潮〉，收錄在氏著《跬步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頁277~310。

〔註24〕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2004），第六章「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發微」，頁249~332。

〔註25〕筆者所見不是一味地從「良知」概念來論述陽明思想的發展，只有林聰舜，〈道德與事功——由知行合一探討陽明思想產生歧異發展的根源〉，收錄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編，《陽明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89），頁87~104；以及鍾彩鈞，《王陽明思想之進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都強調陽明「事上磨練」的概念來觀照其思想的發展。

蹟方面，錢明討論到陽明的家世問題，不但說明其家族源流，也談到父親王華、祖母岑氏等人對陽明的影響。〔註26〕而對陽明的家學，大多數的研究，都引《年譜》中的說法，認為王家是以《易》學傳家的，但日本學者鶴成久章則考證出自陽明父親王華開始，《禮記》成為其家學，且陽明亦以《禮記》考上進士。〔註27〕此外，錢明不但考證陽明在家鄉的活動，例如陽明究竟是何時遷居山陰縣的，〔註28〕也曾考察陽明生平經歷過地方遺跡，〔註29〕而陳來也曾討論到陽明在家鄉活動的場所。〔註30〕在陽明入仕前後的活動方面。錢明針對陽明與當時吳中地區文人的交誼，作了一番的清理。〔註31〕陽明早年力學詩文，也曾經結詩社於龍泉山，但不知這與其後來跟文人間的來往，是否有關連。

上疏言事方面。方志遠雖然沒有提及陽明上疏之因，但以《明實錄》所載與《年譜》相較，認為陽明被貶謫的時間應是正德元年十二月。〔註32〕而針對陽明因劉瑾的迫害而投江入海的「泛海事」方面，方志遠認為這是陽明為了要避禍遠去的託詞，並且說到陽明是在劉瑾伏誅前即升任廬陵知縣的。〔註33〕張永堂則是蒐羅與陽明相關的「術數」資料，來說明陽明家族及其自身與「術數」思想間的關係，其中就有此「泛海事」一類。〔註34〕另外，楊儒賓則是以陽明與羅近溪為例，來說明「異人」的概念，其中對陽明而言，鐵柱宮道士即是此「異人」。〔註35〕

平南贛盜方面。早期高銘群曾就陽明此時期的活動，編了一個簡譜，〔註36〕

〔註26〕 錢明，《儒學正脈——王守仁傳》，第一章「顯赫世家」，頁1～27。

〔註27〕 〔日〕鶴成久章，〈明代餘姚の「禮記」學と王守仁——陽明學成立の背景について〉，《東方學》111（2006），頁123～37。

〔註28〕 錢明，〈王陽明遷居山陰辨考——兼論陽明學之發端〉，《浙江學刊》1（2005），頁91～8。

〔註29〕 錢明，〈王陽明史迹論考〉，《國學研究》11（2003），頁47～85。

〔註30〕 陳來，〈王陽明與陽明洞——王陽明越城活動考〉，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545～59。

〔註31〕 錢明，〈王陽明與明代文人的交誼〉，《中華文化論壇》1（2004），頁88～94。

〔註32〕 方志遠，〈陽明史事三題〉，《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36：4（2003），頁99～106。

〔註33〕 方志遠，〈陽明史事三題〉，頁100～1。

〔註34〕 張永堂，〈王守仁與術數〉，收錄在劉澤華、羅宗強主編，《中國思想與社會研究（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509～32。

〔註35〕 楊儒賓，〈王學學者的「異人」經驗與智慧老人原型〉，《清華中文學報》1（2007），頁171～210。

〔註36〕 高銘群，〈王守仁南贛活動年譜〉，《贛南師範學院學報》4（1982），頁46～51。

其資料來源主要依據《年譜》及《明史紀事本末》。閻韜則針對文獻記載的不同，得出是胡璉帶兵破長富村，而非是楊璋。另外也對詹師富在何處起義？以及左溪一地又在何處？做出考證。〔註37〕不過，閻韜認為《明實錄》所載陽明事蹟多有貶抑，實與撰修者費宏及董玘有關。但就筆者的觀察，費宏一家被宸濠逼到家破人亡，而董玘又與陽明關係交好，實在沒有理由這樣做，而《明實錄》之所以這樣記載，主要還是因為總裁官楊廷和之故。〔註38〕吳振漢則是從地方志中，耙梳相當多的史料，來說明陽明在平南贛盜及宸濠之亂時的相關問題，例如糧餉、兵力人員來源以及功成之後的部屬升遷問題。他認為在宸濠之亂後，陽明的部屬之所以星散四方，其原因並未像史書所言是受到政治上的打壓，其真正的原因是明朝政府的官員遷轉辦法所導致。〔註39〕周建華也曾將陽明此時期活動編了一個年譜，較之於高銘群之作，是於陽明此時每一年活動的敘述中，加上陽明之詩文篇目；〔註40〕在其另一文中，也簡要說明陽明在龍南地區活動與遺跡。〔註41〕對於陽明平南贛盜的軍事活動，黃志繁認為陽明所為只能濟一時之需，無能根本解決盜賊問題，主要原因是當地盜賊與民及官府間三角複雜關係所致。〔註42〕不過，筆者則認為陽明早在平南贛盜後，就很清楚盜賊叢生的真正因素是朝廷橫征苛斂所致，例如他有一詩云：「莫倚謀攻為上策，還須內治是先聲。功微不願封侯賞，但乞蠲輸絕橫征。」〔註43〕周志文則認為相對陽明平宸濠及征思田二州的軍功，平南贛盜則甚少為人注意，故其仔細說明陽明平南贛盜的歷程則如選兵、強調賞罰、戰術的運用等等。〔註44〕曹國慶認為陽

〔註37〕閻韜，〈王守仁巡撫南贛史實的幾點辨誤〉，《文獻》3（1989），頁112～7。

〔註38〕閻氏的說法恐怕是受到〔明〕王世貞說法的影響，王氏在其〈史乘考誤八〉中說到：「文憲（費宏）在文成撫綏之地，與逆濠忤被禍。中外之臣皆屢薦而起之，而文成亦未有一疏相及，費當亦不釋然也。董公（玘）最名忤毒于鄉里，如王鑑之輩，巧詆不遺餘力，既又內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楊費，作此誣史，將誰欺乎？」《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27，頁485。

〔註39〕吳振漢，〈王守仁撫贛時期的文人領軍〉，《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19（1999），頁35～67。

〔註40〕周建華，〈王陽明南贛活動年譜〉，《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2002），頁26～31。

〔註41〕周建華，〈王陽明在龍南的活動和遺跡考釋〉，《南昌教育學院學報》18：1（2003），頁32～3。

〔註42〕黃志繁，〈在賊與民之間：南贛巡撫與地方盜賊——以王陽明為中心的分析〉，《中國歷史評論》4（2002），頁65～74。

〔註43〕〔明〕王守仁，〈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1517）〉，《王陽明全集》，〈外集二〉，卷20，頁750。

〔註44〕周志文，〈陽明在南贛〉，收錄在《東西文化會通——井上義彥教授退官紀念論